

Raleigh Times
Mar 21 / 1938
PAGE SIX
TUESDAY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RANDOLPH TRACES
GROWTH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T
Increased Pers
Key Positions Need Of
Health Board

庄士敦是个英国人，能够走进紫禁城作大清帝国末代皇帝的老师，这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一份”，这本身就足以产生许多悬念：他教什么、怎么教？师生关系如何，皇室欢迎吗？只搞教学，还是难免涉足政治？

「英」庄士敦 著
淡泊 思齐 译

我在溥仪 身边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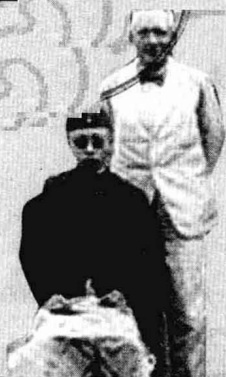
末代皇帝师傅的回忆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我在溥仪 身边十三年

「英」庄士敦 著
淡泊 思齐 译



末代皇帝师傅的回忆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溥仪身边十三年:末代皇帝师傅的回忆 / (英)
庄士敦著;淡泊,思奇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195-969-0

I. 我… II. ①庄… ②淡… ③思… III. ①庄士敦, R. F.
(1874 ~ 1938)—回忆录 ②爱新觉罗·溥仪(1906 ~ 1967)—
生平事迹 IV. K825.4 K827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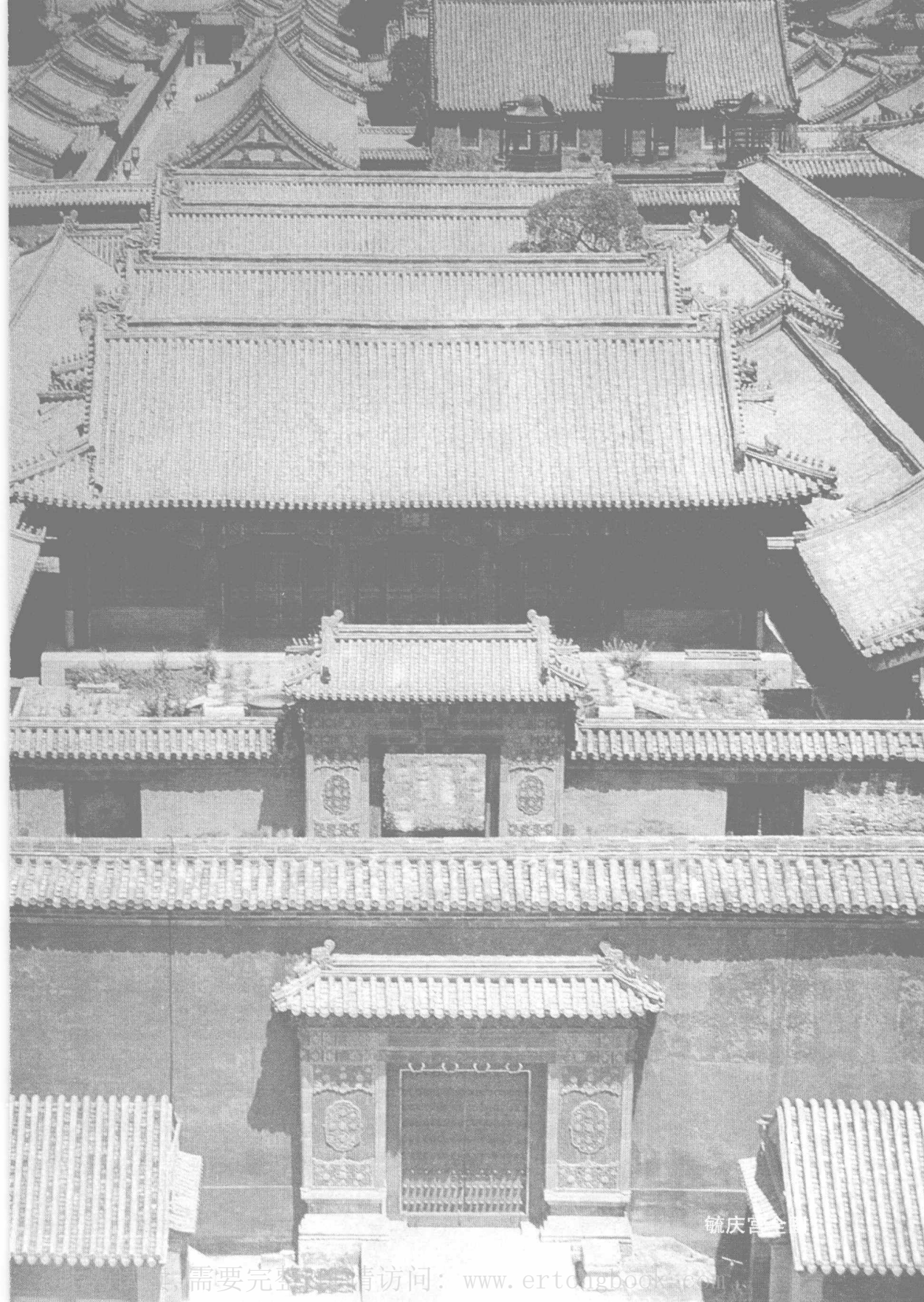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165 号

我在溥仪身边十三年——末代皇帝师傅的回忆

作 者	(英)庄士敦
译 者	淡泊 思奇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969-0/K · 157
定 价	32.00 元

作者 庄士敦





毓庆宫



译者前言

《我在溥仪身边的十三年》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师傅雷金纳德·F. 约翰斯顿(中国姓名为庄士敦)亲笔撰写,于1934年3月由伦敦维克多·高兰兹有限公司出版。书成之后,一年之内就印行了三版,其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庄士敦系苏格兰人,早年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曾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对中国的灿烂文化怀有仰慕之情。大学毕业后不久,便踏上了他久已向往的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土地,在这里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他对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均有较深的研究,对佛家释典和孔孟之道,造诣尤深。既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又会说广东等地的方言土语。人们称他为“中国通”,不是没有道理的。

庄士敦出使东方,始于1898年,历任香港英总督私人秘书、辅政司和英租界威海卫行政长官等职。1919年3月,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通过外交途径,受聘为宣统皇帝的英文教师。由于他尽职尽责,溥仪曾颁布“上谕”一道,赏他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月俸银元1000元。在几位“帝师”中,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最深。当时溥仪在紫禁城的小朝廷里演出的种种闹剧,无一不与庄士敦有关。

庄士敦在华期间,前后从溥仪于北京天津之间者,凡13年,对清廷之晚景、皇室之内幕以及溥仪离宫前后之经过,耳闻目睹,知之最详。因此,本书所写,亦可谓作者亲身经历之实录,对读者了解和研究晚清宫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书的重点,也就是作者所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记述清王朝盘踞紫禁城200余年后的“黄昏时期”——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1912年初开始,至1924年11月末代皇帝被逐出宫为止——的没落情景。但是,为使不熟悉中国近代政治历史的外国读者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作者也涉及“黄昏”之前已被阴云遮暗的“阳光”和“黄昏”之后随之而来的“暴风



雨之夜”。现为突出本书的重点,并考虑到阅读中译本对象——中国读者的兴趣,我们决定将前五章多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史事略去,开门见山地从“辛亥革命”这一章译起。因为没有辛亥革命,也就不会有紫禁城的黄昏和夜晚。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力求能够忠实原意,但由于水平有限,又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再加上个别引文和史料一时还难以逐一查对,译文势必有不妥和谬误之处,敬希专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目 录

CONTENTS



1 辛亥革命

有一种传说,谈到光绪皇帝去世以后,人们在他的文卷中,发现了一份关于立即处死袁世凯的谕旨。一些皇室成员认为,这是皇帝的临终心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由于他们对袁世凯本来就存有的戒心和不信任,于是他们表示必须执行光绪皇帝的临终谕旨。但是醇亲王对此犹豫不决,经过一番拖延之后,决定饶袁世凯一命,只是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以恢复健康为由,令他引退还乡。

17 清室“优待条件”

如果对那种妥协没有足够的了解,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在革命和推翻帝制后还会出现一个漫长的“紫禁城的黄昏”时期。在此期间,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但仍保留皇帝身份和尊号的清朝皇帝继续把守朝廷,占据龙位。如果对那种妥协的条款不进行研究,要想掌握中国的大清末代皇帝首次返回其祖先在满洲的故里、尔后在那里登基的长篇传奇故事的线索,也是不可能的。

29 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这个能干又无耻的政治家成了民国的总统,这并不是由于革命党人对他的信任,而是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别无他法。曾被革命党任命为临时大总统的孙逸仙,把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为此,他经常受到人们的赞扬,认为他宽宏大量。其实,孙逸仙这样做,也是由于他别无选择之故。

45 张勋与丁巳复辟

这些政治集团包括南方的国民党,它在孙逸仙的领导下已在广州成立一个对立的政府。黎元洪总统不得不解决的主要困难之一,是中国是否应该参加协约国和对德宣战的问题。孙逸仙及其追随者坚决反对中国参战,虽然胜利后他们渴望得到作为协约国成员所能得到的利益。



57 1919~1924 年的紫禁城

尽管徐世昌就任总统,但他根本不信仰共和。北洋政治家中即使有信仰共和的,也为数无几。他就任后的第一个正式法令,就是赦免那些曾经参与丁巳复辟的人,张勋也无例外地得到了大赦。张勋的赦免和他的同伙们一样,是无条件的,虽然他并未伪装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

74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

皇帝对他的每一位师傅——即使是来自海外的蛮夷——都很尊敬,这种尊敬的另一个标志,便是当师傅进入书房时,皇帝离座起立。师傅向前走至屋子的中央,一鞠躬,然后,皇帝和师傅便同时落座,各就各位。如果在讲课过程中,师傅为了去取书架上的一本书或是因为别的什么事而离座时,皇帝也要离座起立,直到师傅返回自己的座位时,他才坐下。

86 黄昏中的清朝宫廷

幸运的是我们这两个穿黑色大礼服的人并不惹人注目,不至于使庆典活动显得美中不足。我们两个人另外站在一旁,不和穿貂皮朝褂的王公大臣们站在一起。等他们行礼之后,鸣赞官请我们个别上殿,行三鞠躬礼便行了。但由于我每次都受到皇帝的赏赐,因此在三鞠躬之后,再一次三鞠躬,以表示谢恩。当我行礼时,皇帝坐在宝座上一点不动。因按礼仪规定,皇帝在接受王公大臣们行礼时不应说话、不应笑、不应挥手或点头,而只有当他的父亲向他行礼时,他才能有所反应。

97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

像大多数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以前我也曾认为清朝王朝的垮台是由于王公亲贵们的无能、无知和贪婪,是由于慈禧太后的错误和罪恶或者是她的用人不当,是由于东、西方那些“野蛮人”对它的严重打击,是由于过度腐化奢侈而带来的软弱无力,是由于西方民主思想的侵入和它们对“年轻中国”的幼稚心灵的不良影响,是由于中国人对一个“外国”王朝的憎恨,还由于他们日益相信统治了他们二百多年的“异族”已经“耗尽了天命”。

109 羽毛未丰的龙

我和我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友好融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好融洽日益增进。我发现他身上那些非常吸引人的品质是:他全面的聪明才智;他的坦率;他对中国事务和世界大事所表现的热切关心;他对人的宽宏大度;他的艺术才华;对于那些曾无礼地对待过他,或者曾经是与皇室敌对的人,他都不念旧恶;他对苦难者所表现的仁慈和同情;他临危不惧的勇气;以及他那强烈的幽默感。

124 君主主义者的希望与梦想



苛捐杂税和官吏们的贪赃枉法,使人民渴望恢复清朝王朝。人们认为,清朝虽然坏,但民国却比它坏十倍。不仅在这个边远的地区可以听到这些对清朝怀念的感叹,而且其他省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盼望着清朝王朝得以重建。

137 烦躁不安的龙

年轻的清朝皇帝非常渴望到紫禁城外去看看现实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其心情之迫切远非当年想要离开阿比西亚幸福谷的拉塞拉斯皇帝所可比拟。他有时从御花园的假山顶上或从神武门城楼上向外窥望,看到外界一些事物更加使他心神不能平静,总想出去玩玩才觉得过瘾。然而当他请求到紫禁城外去的时候,总是得到同样的答复——外界危险,南方孙逸仙革命分子的间谍埋伏在外边等待着他,他会受到侮辱、殴打,或者被置于死地。

146 振翅欲飞的龙

皇帝教室的墙上挂有一幅卷轴,上面写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听了皇帝讲述他是如何被告知要把人民看作敌人之后,我对他说,如果再听到同样人物的这种说法,他就应该命令他的师傅注意一下那幅卷轴,并建议他把卷轴取下藏起来,因为题词所根据的原则显然不再有效了……

166 龙凤呈祥

这一天,皇帝升入乾清宫的龙座,接受满蒙王公、内廷大臣和那些过去曾在朝廷忠实供职而现在仍然一往情深地把他们看做是最后一个皇帝的前大臣们的祝贺。这些人都穿着满洲当时流行的礼服或朝服。此外,还有许多民国的文武官员,他们的服装——西式制服和燕尾服——同旧时清朝官员穿的那种古香古色的皮绸大褂形成了令人心烦的对照。

177 阴谋与策略

他们的习惯作法是把物品卖给一小撮商人垄断集团,这个集团同内务府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这就使得彼此完全了解的双方容易在相互满意的条件下进行协商。实际所付的价格远远超过了记入宫中账目的价格,但却远远低于物品出售的市场价值。真实价格与虚构价格之间的差别如何,乃是一个小的秘密,要揭露它,对任何一方都不利。

191 回忆御花园

1923年底之前,我同皇帝的关系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非正规的关系,我的地位与其说是师傅,不如说是同伴。自他结婚以后,便停止了毓庆宫的正规学习,我虽然每天都要进宫去拜访他,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陪着他,但是觐见的并不固定。我们照常在他自己的住宅见面,或在新辟的娱乐场,或在以前被认为是专供皇帝和妃嫔们行乐之用的御花园。

201 颐和园逸事



他“暂居”紫禁城已经有十二年了(到1923年底),皇室丝毫没有表明其移居之意。这就很容易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文字上)成为指控皇帝破坏退位协议的理由。那些愿意废除协议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非常积极和恶毒反清的政治家和受了共产党宣传影响的进行武装骚乱的学生——自然高兴地把这一废除协议的责任从他们的肩上推卸到皇帝身上,如果找不到比皇上没有迁往颐和园更有力的背信弃义的证据,他们无疑将会以清室破坏“优待条件”这一事实来为他们宣布协议无效的行动作辩护。

217 溥仪出宫前后

吴佩孚的这一谋略并没有什么差错,只是选派基督将军担负保卫北部关隘的任务却铸成了他一生中代价最昂贵的大错。也许是因为他既不愿冯玉祥分享攻入沈阳的胜利果实,同时,又不大放心让他留下来管理北京地区的缘故。他显然没有想到这是在为某个人的利益而战,这个人就是对他怀有旧怨、而忠诚和绝对服从的名誉已令人怀疑的冯玉祥。

232 龙困牢笼

这一足智多谋的宣传计划一开始就因三名欧洲使节公开向“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的抗议和警告而遭到挫折。要使北京或中国相信冯玉祥采取的行动是出于对“紫禁城囚犯”利益的仁慈的关心,或者“囚犯”本人把冯的士兵作为解放者来欢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是冯玉祥的一些教友,他们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他们这位英雄的声誉,绝不愿意改变他们对基督教义的真诚信仰。

243 龙脱困境,驾雾腾飞

到了司令部,我们穿过一系列住满了元帅武装警卫的院落。他以友好的态度和非正式的形式接待了我们(他穿着中国的便服),在他的同僚们在场的情况下同我们谈了几分钟的客套话之后,要我们陪他一起到一间秘密的小书斋。在我们此后的谈话期间,门一直关着,就连平时送茶的服务员也不许进来。

260 历尽艰险,龙归故里

他从城墙上第一次看到树木参天的天坛公园,但看不见作为天子和人民之父每逢节日都要到那去祭天的汉白玉大祭坛。他从城墙上也看到了闪烁着的紫禁城的黄屋顶,这里虽然在某些方面也许是囚禁他的监狱,但毕竟从其幼年时期开始就一直是他的家。一天晚上我们在城墙上散步,突然发现一个单身黑影朝我们走来。我低声告诉皇帝,当此人经过我们要仔细观察一下。

276 鸣谢

辛亥革命

幼小的溥仪于1908年10月登极，按照中国历代王朝均有年号的惯例，他即位后的年号定为“宣统”，因此人们通常便把年号当做他本人的名字，外国人尤其如此。其实，这样做反而有其方便之处，因为在中国，皇帝本人的名字在其生前属于避讳之列，人们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用与“皇帝陛下”意思相同的“皇上”二字来称呼。即使在皇帝去世以后，也不能称呼其本名，而应尊之以庙号，根据祭祖的礼仪进行祭祀时用皇帝的庙号，在记述历史以及在谈话和书写时也都用庙号。在宣统之前的那位皇帝名载湉，这个名字——更确切地说是名字的第二个字——是要避讳的，公众不能用这个字，甚至在朝廷中也不能用这个字。载湉在世时的年号是光绪（对此当然无忌讳），他去世后的庙号是德宗，在有知识的中国人看来，如果用“光绪皇帝”这样的称呼，则



大清門



会被视为粗心,或者是无知,甚至是缺乏教养的表现。因此,对他的正确称呼是“德宗皇帝”,外国人一般都知道的乾隆皇帝,正确称呼应该是高宗皇帝。

一个新年号的变更,是随着上一个皇帝的去世而开始的,因此,1908年即相当于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光绪末年,1909年则为宣统元年。

溥仪即位后,作为摄政王的醇亲王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以袁世凯的足疾为借口,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令他回籍养病。对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作用和他对皇帝的背叛,人们都记忆犹新。但是从那时以后,袁世凯便一直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青云直上。他于1901年任直隶总督,1903年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任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毫无疑问,他很清楚自己的官运——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是有赖于慈禧太后这样一位庇护人的权势来维持的。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义和团起义之后,他极力反对太后撤帘归政使光绪恢复亲政的事了。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不幸的是袁世凯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望,这是由于袁世凯一开始就识破了义和团的意图,并于1900年运用自己山东巡抚的地位,保护了当时在山东的所有外国人的缘故。此外,他还是个投机分子,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袁世凯清楚地意识到,慈禧太后把她自己与义和团联系在一起,并对列强采取蔑视态度的做法都是愚蠢的,像袁氏自己这样一个具有开明见解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戊戌政变那段不愉快的事件而使他无法得到他背叛过的皇帝的宽恕,那他很可能运用他的超乎寻常的影响,同外国列强和解(包括让慈禧太后引退而使光



少年时的溥仪



天安门

绪皇帝重新亲政)。事实上,袁世凯的命运是与太后的命运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之所以竭力地维护太后的利益,是因为他完全清楚,这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袁世凯与皇帝之间不仅没有重新和好的可能性,并且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幸存者之间也存在着无限的仇恨。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们自然认为,袁世凯不仅是皇帝的叛徒,而且是在慈禧太后那年发动政变后对他们的六位同事处以死刑的主要责任者。另一方面,袁世凯自己也担心,如果允许康有为及其一伙恢复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并在朝中获得立足之地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对他进行报复。这就是为什么当慈禧太后亲自主持新政之后,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们未被邀参加这一新政的推行,并未对他们过去的过失给予宽恕的部分原因。

有一种传说,谈到光绪皇帝去世以后,人们在他的文卷中,发现了一份关于立即处死袁世凯的谕旨。一些皇室成员认为,这是皇帝的临终心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由于他们对袁世凯本来就存有戒心和不信任,于是他们表示必须执行光绪皇帝的临终谕旨。但是醇亲王对此犹豫不决,经过一番拖延之后,决定饶袁世凯一命,只是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以恢复健康为由,令他引退还乡。

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醇亲王显然是既轻率又愚蠢。因为,袁世凯对北洋的实力派和新军的影响是很大的。摄政王应当预见到,像袁世凯这样一个有魄力、有能力和有权势关系的人物,是不会甘愿以研究佛经或练习书法来



度过余生的。然而，袁世凯却服从了对他的处理，并且毫无怨言，也没有片刻的拖延。这件事如此迅速而又平静地得以解决，其本身就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表明，即使是在这个王朝存在的最后几年，这片土地上的地位极高和权势极大的官吏们，也仍然是服从皇帝谕旨的。如果这事件发生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的所谓共和时期，那么，对袁世凯的免职，随之而来的倒很可能是他的“独立宣言”和一场灾难性的内战。袁世凯左右北洋军——这个帝国中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力量无疑是很大的；不过，这些军队还没有成为指挥官的私人财产和可以用来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事实上，君主政体依然存在，皇帝仍旧在位。

但是皇帝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上述传说中的其余内容很快地就传开来了。摄政王感到困难重重，而这些困难又远非他所能克服。为了安宁起见，他想使每个人都高兴，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是无法做到的，原因之一，是他不得不应付一位新太后，她就是“老佛爷”的侄女、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光绪皇帝的临终谕旨里，有一项内容的大意是，一切重要之事，摄政王皆须禀明新太后，并“领其懿旨”。人们可以想象，这项内容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叶赫那拉氏的地位而加进去的，尽管这也许是真的，但这与中国正统的道义准则也并无相悖之处。以上情况说明，一位太后仅仅是凭借自己与皇帝的关系便可拥有各种权力和特权，而且，即使在皇帝的这一临终谕旨中没有提及太后，但是在一些能影响这位幼小皇帝的事情上，甚至是在一般国事上，她总是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说服皇帝的（这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也并非不合情理）。她不仅是皇帝的姻亲伯母，不仅是太后，而且由于这位幼小的皇帝即位后成了她丈夫光绪的嗣子。因此，她还可以要求作为母亲的亲属关系和权利。

立宪改革的运动在继续推进，的确，运动的势头已使得任何企图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行动都将是危险的。醇亲王和他的对手隆裕太后都不愿去冒这个不必要的风险。1909年初，清廷曾发布一道上谕，要积极建立立宪政体，一批反对革新的守旧官僚被撤职，或受到其他的惩处。皇帝的一位叔父载洵，作为一个使团的团长被派往英国考察海军，以便为中国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新型舰队。他在欧洲逗留过一段时间，他经常向我谈起一些在英王爱德华宫中的见闻。他的兄弟载涛，则作为另一个使团的团长被派往德国学习军



事,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盛情款待,这使他一直与德国保持着友谊。这两个使团的派出纯属徒劳无益,因为在中国内政尚未革新,健全的财政制度尚未建立之前,要想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和陆军都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却希望欧洲这两个拥有最强大海军和陆军的军事强国,会由于自己把他们当做榜样来学习而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请愿书不断地送到北京,敦促早日实现已决定召开的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这些请愿促使摄政王于1910年11月4日发布诏书,宣称原定召开国会的准备时间要缩短,国会将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诏书还宣布宪法、法规和上、下议院议员的条件,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立宪改革之事,均须在国会召开前准备就绪并付诸实施。

同年,孙逸仙的追随者汪精卫,曾企图行刺摄政王未遂,而醇亲王却打算和解此事,把汪精卫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汪精卫后来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

1911年,以皇太后隆裕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任命三位帝师在毓庆宫



溥仪和陈宝琛(右)、
朱益藩(左)在养性斋



教六岁的幼帝读书。紫禁城里的毓庆宫,一直都是供皇帝用的上书房。在这三位师傅中,有两位后来成了我的同事,以后在本书的许多地方都会提到他们。

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不断听到全国各地的造反消息。于是清廷对于自由主义思想作了让步,同意制订议会章程,并把专制统治改为君主立宪制,但是动乱并未因此而减少。实际上,局势更加恶化了,因为造反者们认为,这些让步并非表明朝廷的诚意,而是朝廷虚弱的表现。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将领的黄兴,在广州领导了一次危险的叛乱,捣毁了总督府。黄兴受挫失败后,便逃往香港,在那里,他像许多先后到香港去的其他革命者一样,在不列颠旗帜的保护下,继续从事反抗清朝王朝的活动。

当时,摄政王试图任命一个多少有点西方模式的内阁,以便与敌对者们进行和解。但是,由于内阁中包括了过多的满族王公亲贵而立即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在清朝最后的那些年代里,这事便成了对朝廷不满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和非常正当的理由。一些王公亲贵们获得了高位,但这些人都是不称职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仅仅因为他们是皇室成员而已。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或者贪婪,或者无能,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使得朝廷丧失了信誉。然而,与一般的想象相反,皇族并不是那么的腐败,皇族中也有一些有才能和有声望的人,但不幸的是,在太后和醇亲王控制之下,获得高位者,不一定是或者往往不是最有才干和最优秀的。

使中国的铁路国有化而置于中央的统一控制之下这种不适宜的尝试,往往被说成是爆发辛亥革命的直接起因之一,虽然这种尝试基本是合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然而,1911年9月在四川的暴动和同年10月在武昌的暴动,实际上都是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一些小规模暴动的重现。武昌这个地方由于偶然发现的一个阴谋而成了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于是黎元洪将军在这里被迫勉强出任军政府的鄂军大都督。

在无知而又无能的隆裕太后和软弱而又“无用”的摄政王的统治下,北京政府很快地就陷入一种近乎愚蠢的状态。醇亲王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曾犯过一些严重错误,而现在他还在继续犯着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决定或者他被说服要恢复一个人的职务,而这个人正是他最危险的敌人,是三年前被他贬黜并使之丢脸的那个人。